

黑盒子被打開了嗎？

談「田野工作」與學術知識建構的關係¹

陳文德

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

《田野的技藝：自我、研究與知識建構》，郭佩宜、王宏仁主編，台北：巨流圖書公司，2006年，312頁。

《以身為度，如是我做：田野工作的教與學》，謝國雄主編，台北：群學出版有限公司，2007年，399頁。

It [field work] is, more than other methods of study, itself a practice, consciously undertaken in sociology itself...

Everett C. Hughes (1960: vii)

An anthropologist of all people ought to be conscious of the extent to which his intellectual life is a product of his interaction with other minds.

Malcolm Crick (引自 Karp and Kendall 2001[1982]: 29)

一、前言

從去年初到今年春，國內相繼出版《田野的技藝：自我、研究與知識建構》（簡稱《田野的技藝》）和《以身為度，如是我做：田野工作的教與學》（簡稱《以身為度》）這兩本關於田野工作的論文

1 撰寫本文最初的動機來自謝國雄先生的敦促與刺激。限於篇幅與個人學科背景，本文引用的文獻主要跟二書引發的問題有關，尤其是田野工作跟人類學學科知識發展的關係。筆者感謝謝國雄、鄭依憶和黃郁茜對於本文初稿提供了諸多寶貴的意見，唯一切文責筆者自負。為行文方便，本文以「他們」取代「他／她們」指稱第三人稱多數。二書目錄附於文後，以便參考。

集。《田野的技藝》是由十一位已經拿到博士學位，並且在國內教學或研究機構服務的學者撰寫的，內容是關於他們各別田野經驗，田野研究地點包括台灣、日本、東南亞和大洋洲。以學科背景來說，十一位作者中，人類學八位、社會學三位，主編則是人類學（郭佩宜）和社會學（王宏仁）各一。相較之下，《以身為度》一書作者們的學科背景都是社會學，是編者謝國雄個人研究心得以及八位修習「田野工作：範例與實做」課程的學生的成果報告。他們的田野地點是今日台灣社會生活中的不同場域，從軍中、女同志、空服員、電視購物到茶鄉等。

田野工作(fieldwork)在社會學與人類學的發展過程中有著重要的位置，然而，由於一些主、客觀因素，使得它在兩門學科卻有了不同的境遇。對社會學，尤其是在量化研究的思考模式下，田野工作不是被視為質性研究的一種方法，就是樣本採訪的研究步驟。²相較之下，田野工作在人類學的命運就很不一樣；田野工作不但被認為是人類學學生的成年儀禮——尤其在英國社會人類學的傳統——更是人類學做為一門專業學科而有別於其他人文社會學科的標記（參閱 Gupta and Ferguson 1997）。其重要性就如英國人類學者 Charles G. Seligman 所說的，「田野調查之於人類學，就如殉道者的鮮血之於教會」（Field research in anthropology is what the blood of the martyrs is to the Church，引自 Lewis 1996: 1）。

在這樣學科發展的脈絡下，《田野的技藝》的發行，固然再次說明田野工作對人類學的重要性，但在強調量化研究為主的社會學界（謝國雄 1997: 305），出版強調田野工作重要性並標示「田野工作的教與學」的《以身為度》，就顯得特別有意義。當田野工作已成為人類學獨佔的學科標記，而社會學或其他學科也強調它的重要性時（參

2 在 *Field Work: An Introduction to the Social Sciences* (Junker 1960) 一書的導論中，Everett C. Hughes 一方面強調田野工作對於社會學的重要性，另一方面卻也指出，由於量化方法的發展，不但田野工作成為「人類學的」方法，「調查」(survey) 一語也被賦予新意，以問卷訪問為主；「去田野」(going to the field) 就是訪問樣本的意思，而與芝加哥社會學原先強調的田野觀察的意義不一樣了(pp. vii-x)。

閱 Burgess 1992)，難免一些疑問接踵而來。例如，不同學科的研究者，如社會學、心理學，也認為他們跟人類學者一樣從事田野工作時，他們口中的田野工作是指什麼？是否只是方法論層次的問題？不同的學科又賦予它在學科知識建構怎樣的位置？另一方面，二書，尤其《田野的技藝》，都提到「研究者」這個因素在研究上的重要性（參閱 Hughes 1960; Karp and Kendall 2001 [1982]）。除了帶給研究者對於學術、人生觀念的改變，這些個人經驗在知識建構的過程又有怎樣的重要性？換句話說，這些疑問終究回到一個基本的問題：田野工作與學科知識建構的關係。

《田野的技藝》和《以身為度》在成書目的、設定的閱讀對象、作者背景（包括學科訓練和撰寫時的情境），以及對於田野工作這個議題的處理，明顯不同。這樣的差異也見於二書文章的體例和問題提問的方式。儘管如此，二書一致認為「田野工作」與學科知識、理論議題有著密切的關係，不只是一種研究法。若交錯對照二書的討論，實可相得益彰，有助於深化「田野工作」這個議題的討論，並彰顯田野工作在不同學科知識建構過程的異同，引發更多有意義的討論。因此，本文第二、三節分別扼要描述《田野的技藝》和《以身為度》的內容，以及二書如何處理田野工作與學科知識建構的關係，第四節則從人類學對於田野工作的討論，提出一些想法做為參考。

二、《田野的技藝》：話說當年

《田野的技藝》一書的作者們以不同方式回憶著他們各自的田野經驗，例如，如何進入田野，進入田野後的遭遇、挫折、抑或心得，甚至變更研究計畫。進一步而言，林開忠的砂拉越經驗、張雯勤的泰緬地區雲南移民研究，或者莊雅仲參與社區的社會運動，雖說田野地點、研究議題和田野經驗不大相同，但都揭露田野研究之可行實涉及其間錯綜複雜的政治經濟情境；攜帶幼女（或家人）到田野的經驗，使得趙綺芳有機會從家長的身分，對於竹富島有著新的接觸、感受與

理解；邱韻芳在花蓮 Truku（太魯閣）以及林秀杏穿梭於故鄉和他地的田野經驗，分別因為個人生命遭遇，而引發出情感和身體做為承載知識可能性的疑問；同樣是被當地人給名的例子，郭佩宜從她的經驗呈現出所羅門 Langalanga 人看待外來者的方式，顧坤惠則深刻體會排灣人為了給她一個適合他們階序體系的名字所費的心思。躲過九二一大地震一劫的容邵武，不但面臨研究主題失去或消失的問題，身體與心理衝擊下的生命轉折，更讓他反思研究工作的意義。相較於上述這些定點的研究經驗，王宏仁和龔宜君因為研究的需要，把觸角延伸到東南亞的台商，除了比較兩地的差異，也帶出跨國企業和資本主義經濟研究的可能性。

不論是來自台灣本地或者東南亞、太平洋的他鄉經驗，順暢文筆揭露了研究者學術之外鮮為人知的辛酸、痛苦、喜悅甚至恐懼之情。娓娓道來、如數家珍的田野回憶，交織著他地異景的描繪，讀來令人如臨其境。此外，書中每個主題之後另有編者以〈賦格曲〉為名，引伸作者們田野經驗可能隱含的問題。相較於學術論文向來的深澀，本書充滿作者個人的色彩，又可從中略見當地社會文化的些許面貌。這種兼具生活經驗與學術討論的體例，對於作者們設定的人文社會科學相關科系入門學生，某種程度的吸引力與回應是可預期的。這也是本書最為成功的地方。對於這群服務於研究或教學機構的作者們來說，透過（研究者）自我、研究與知識建構三者的共構，是學術實踐的一種方式（頁 xi）。「人生不只是學術研究而已，……除了研究與知識建構的歷程外，還有『自我成長』的體驗」這段話（頁 viii），實為本書內容與書寫方式做了最適當的註腳。

整體來說，《田野的技藝》述說與剖析田野中的經歷對研究者自我成長的重要意義，以及他們對於學術研究的看法。在台灣人類學界，以個人田野經驗談論田野這門「技藝」，的確少見，這樣的嘗試是值得肯定的。

如果田野工作是人類學建構知識的重要來源(Hastrup and Hervik 1994)，那麼研究者如何在田野過程中建構學科知識？研究者本身在其

中所扮演的作用為何？這些都是值得探討的問題。對於向來被視為學科標記卻又有如「黑盒子」般的田野工作的性質，也具有釐清的意義。就如編者所說的，本書緣起背後的理論基礎是：「田野主觀經驗和互動過程的重新檢視與思考，貼近人類學／社會學知識論的核心；超越個人經驗層次、細微的理解背後的意義網路及其運作，將有助於我們對文化、社會以及文化交會的理解」（頁 iv）。

然而，讀完本書後的一個直接感覺是：田野工作似乎成爲作者個人回憶與述說田野經驗的舞台，儘管其間也有因爲田野遭遇而浮現出些許當地社會文化的訊息。換言之，雖然作者們提到因爲田野過程中的挫折而反思研究對象與目的，甚至改變研究對象，或者因爲田野經驗引發對於當地社會文化特徵的思索，但是對於田野經驗與民族誌知識建構之間關係這個重要問題，沒有提供具體的說明。如此一來，對比作者們從事研究前已有的學科知識訓練，或者日後完成的博士論文研究成果，我們無法得知田野工作在他們建構知識上的位置，也不清楚個人的田野經驗在研究上的意義，「田野工作」似乎等同爲個人的「田野經驗」。

換言之，假如沒有不以文化爲媒介的經驗(no experience unmediated by culture)，跨文化理解如何可能直接透過經驗(Beatty 1999: 74; Tonkin 2005)？如何透過這些個人遭遇來理解研究對象？³ 民族誌理解的發展軌道是否又跟田野經驗的歷程亦步亦趨、平行發展？這樣的個人經驗終究如何可能成爲我們所說的民族誌知識？⁴ 再以被視為田野工作特點的「參與觀察」(participant observation)爲例，「參與」本身

3 美國人類學者 Renato Rosaldo (1993) 提到他因爲喪妻之慟，悲傷的心情讓他開始瞭解和接受他們夫妻研究的菲律賓 Ilongot 人對於獵首行為的解釋：宣洩傷慟而來的憤怒。但是，這樣的說法無法凸顯獵首在該社會文化的複雜意義。Rosaldo 夫婦豐富的民族誌反而告訴我們，Ilongot 人的獵首不但攸關當地社會文化觀念（如尊嚴和男子氣概），也與該區域的政治歷史發展有關。

4 該書一位作者也提到，「個人的生命經驗只是諸多可能激發人類學想像與理解的觸媒之一，更重要的是如何將它與其他田野中獲得的材料對話，進而編織出更細膩的詮釋。若僅僅是沈溺在自身經驗中，非但無法深化對他者的理解，反而可能因此限制了觀看的角度」（邱韻芬，頁 279，筆者強調）。不過就本書呈現出來的資料來看，是與這樣的期許有些落差。

就是一種身體的交會(bodily engagement)，⁵但是藉由身體所感知的，不但形式不一，而且也與當地社會文化的特徵有關（參閱 Okely 2007）。至於田野中的情緒或情感，是否也可能以不同形式呈現，並凸顯出當地的社會文化特性（參閱黃應貴 2002；Beatty 2005）？

讓我們以當地社會如何將研究者納入為例。Ira Bashkow (2006)在巴布新幾內亞東部 Orokaiva 的研究指出，當地人是以他們的觀念與道德經濟來轉換和解釋他們與白人的經驗。筆者在卑南族和阿美族的研究經驗也指出，不論是卑南人以會所名稱稱呼男性外來者，或者阿美族以外來者舉止特徵給名，之後再另以住家老人名字取名，以及之後如何交錯使用，不但顯示出兩族社會文化的差異，也因為與外來者長期接觸的歷史經驗而有所不同。至於 Rita Astuti (1995)在馬達加斯加島 Vezo 人的民族誌，不但具體結合她個人的田野經驗，更指出身分認定的方式實與當地的人觀(notion of personhood)密切關連。

換言之，郭佩宜從田野初始被 Langalanga 人給予"Waetman"（白人）的稱呼，到當地人認為她是「佩宜」，而不是一個一般的「白人」（頁 84-86），這樣的身分轉換是如何可能？如果跟當地強調人的行動有關，其中的社會文化意義又是什麼？與她的研究有怎樣的關係？相較之下，顧坤惠從當地人如何為她取名的個人經驗，指出命名不但與部落內部政治關係有關，也呈現出排灣社會的流動性的特徵（頁 240-241），進而成為她論文撰寫的議題。就內容來說，這篇文章是《田野的技藝》一書中，最具體呈現如何經由個人田野經驗來呈現研究對象特色的例子，儘管我們不知道給外來者和當地人命名的方式有何差異，這樣的經驗對於她原先研究計畫的進行有怎樣的影響，對於排灣族社會又有哪些新的理解。

要言之，筆者認為，如果《田野的技藝》的作者們在回過頭來述說各自田野經驗的同時，也能具體說明田野工作與他們最後研究成果

5 余光弘(1996)對於「參與觀察」與「參加觀察」（「現地旁觀」）的區別，若從"bodily engagement"的觀點來理解，其意義就會更為寬廣。「交會」一詞是來自同事林開世先生的建議，謹此致謝。

(如博士論文)的關係,相信不但可以凸顯田野工作在學科知識建構過程中的重要性,進而思索學科的知識性質,對於該書設定的人文社會科學相關科系入門學生,也更能開啓寬廣的視野與思維。即使是準備從事碩、博士論文研究的學生,從這些事例也可以得到實質的幫助。甚至對比於《以身為度》一書,更能彰顯田野工作在人類學和其他學科建構知識過程的異同,進而引發更多的討論。當「田野工作」一詞已為台灣人文界時髦且濫用時(參閱黃應貴 1994),如何賦予田野工作在人類學知識建構過程的位置,從而面對當代情境的問題有更豐富的理解,更是當務之急。

未了,王宏仁和龔宜君兩位的研究經驗的可能意義,也應該在此略為補充。二人將台灣的研究延伸到東南亞,藉由他們當地田野的經驗,分別使他們意識到權力位階和台商個人自我認同的問題。姑且不論田野的延伸、轉移所帶來的經驗是否帶給作者研究上的突破,就本書來說,比較可惜地是,二人延伸以及連結兩地的討論,並未與多數人類學者定點研究與田野經驗,或者近十餘年來因為面對全球與地方的連結而如 George E. Marcus 提出「多場所民族誌」(multi-sited ethnography),所衍生出來的理論或者方法論的問題,有任何對話(參閱 Bubandt et al. 2007; Olwig and Hastrup 1997; Robbins and Bamford 1997)。如此一來,對於前述所提的不同學科是否對於田野工作有不同的定位與意義的問題,也就失去進一步交會與對話的機會。

三、《以身為度》：田野工作的教與學

田野工作是否在不同的學科有不同的定位與意義?套用人類學常以他者為鏡的傳統,反思習以為常的想法並剔除與批評己身社會文化偏見,《以身為度》對於田野工作的討論有哪些值得借鏡之處?

相較於《田野的技藝》一書,以「田野工作的教與學」做為副標題的《以身為度》,明確地將田野工作做為全書的核心課題,不但以社會學的研究為例,而且凸顯學科議題和知識論在形塑研究議題與問

題思考上的重要性。從書名來說，「以身爲度」在該書有二層意義，分別是(1)田野工作本身即是以身爲度，以研究者自身當做探究被研究者生活世界的媒介；(2)教學本身即是以身爲度，師生各自以其研究與經驗爲例（頁 vii, 359）。「如是我做」是要研究者自我問道：如何探究社會？如何提問？如何進入田野？遭遇什麼困惑？對研究有怎樣的期許與質疑？以及研究對於研究者「做爲一個人」有什麼樣的意義（頁 vii）？至於貫穿全書的主軸則是「四位一體」這個架構，也就是，結合田野工作的技法、社會學做爲一門學科的基本議題、研究者如何知道與認識社會生活的知識論，以及與研究者終極關懷有關但隱晦不顯的存在論，並交集在「田野工作」（頁 5）。

除了編者，本書其他作者幾乎都是在「教與學、學與做」同時進行的情境下撰寫文章，並以個人的研究個案做爲討論對象，讓「四位一體」的四條軸線彼此交錯、對話，進而凸顯其間的張力。因爲如此，加上「四位一體」的架構複雜，閱讀本書時，得專注其間的文脈，唯恐有所疏漏，並且努力在字裡行間發現蹊蹺。雖說如此，細膩、複雜的書寫與思維過程且有如偵探小說般的情節（見劉怡昀一文），令人手不釋卷。

這個「蒐集與創造資料、切磋與創新理論、反省社會學知識的認識論以及呈現各種生命情調相互激盪的存在論」（頁 365）的一石四鳥，顯然來自編者多年來研究的心得（參閱附錄「田野工作：範例與實做」課程大綱，頁 366-376），也具體展現在每位作者進行研究、思考與討論問題的過程。在不同的研究階段，時而藉由作者的田野經驗的述說，時而多層次現象的區辨，時而以轉化資料而與社會學基本議題對話。

除了明確指出隱晦不顯的存在論的作用外，「四位一體」其他三條軸線實際上呼應了人類學者田野工作的一個基本觀點：「田野工作本身是不可能與研究者的人類學理論與民族誌知識分離」（黃應貴 1994: 20）；與民族誌、人類學理論共同構成當代三位一體的田野工作，是無法與（區域）民族誌知識脫離的(Fardon 1990)。若從編者個

人的研究心路歷程來看，之所以有此看法，其實可以理解的，而且可以追溯到《純勞動：台灣勞動體制諸論》一書（謝國雄 1997）。謝國雄在該書第八章〈田野的洗禮，學術的勞動〉的第一段這樣寫著：「首先，我認為田野經驗不僅僅是一個『研究方法』上的問題而已。更重要的是：田野研究本身就觸及了社會學研究的最根本問題，就是一般通稱的『理論問題』——或稱之為『社會生活之本體論與知識論』的問題。第二、田野研究也觸及了『社會學家在這個社會中的存在的意義是什麼』的問題。這樣的一個問題，在田野研究中是以面對面、活生生的方式呈現」（頁 302；另見頁 306）。完成《純勞動：台灣勞動體制諸論》之後，他更進一步如人類學者那樣從事民族誌研究，最後寫成《茶鄉社會誌》（2003），⁶這也就是《以身為度》「四位一體」架構的基礎。⁷

相較於上述十年前的引文，田野工作的定位在《以身為度》一書中似乎更為明確。謝國雄在有如導論的第一章〈以身為度、如是我做：田野工作的教與學〉寫著：「研究者採取了田野工作的技法，目的是要對社會生活中的基本議題有深刻與突破的理解，但也因為這個技法的特殊性，觸動了其認識論的警覺與存在論的關懷」（頁 5）。也就是說，以身為度的田野工作不但同時兼顧「學術與生命」（頁 76），田野經驗也挑戰了「這些社會科學的基本預設，從而可以對相關的基本問題有不同的答案」（頁 86）。

然而，閱讀這段文字後，我們不禁問道：「對於社會生活中的基本議題的深刻與突破的理解，是否只有透過田野工作？如果是的話，如何可能？又如何呈現在具體的研究事例中？」再者，假如每個學科

6 筆者猜想，謝國雄以「社會誌」(sociography)做為該書英文名稱的用意應該是：一方面比擬人類學的民族誌(ethnography)，有個整體觀的作法，另一方面表示社會學這門學科的基本議題终究才是他關懷的。把「社會誌」(sociography)當做方法論的討論，可參閱 Jahoda, Lazarsfeld, and Zeisel (2002)。

7 謝國雄特別強調「參與實做」是社會學田野工作的特色，也是人類學「參與觀察」所不及之處（頁 8）。不過，從「四位一體」的架構以及《以身為度》全書內容來看，「參與客體化」(participant objectivation)或許是較為適切的用詞（參考謝國雄 1997: 324；Bourdieu 2003）。此外，筆者也必須指出，「觀察」(observation)一詞確有不妥之處，因為田野工作者並不是觀察對象的舉動，而是解釋其行動的意義。

都有它關切的基本議題，那麼接下來的問題是：「田野工作對於學科基本議題的討論或思考會帶來怎樣的衝擊？抑或學科的基本議題可能設定問題提問與研究進行的方式？如此一來，田野工作的技法又如何定位？」

換言之，當技法、基本議題、認識論與存在論四者在討論時可以區分，而實做上是一體時，其實際的連結樣態是「因人而異」（頁4），還是決定於四者的位置（或位階）？就此而言，雖然《以身為度》跟《田野的技藝》同樣凸顯田野工作（經驗）的重要性，但是在「四位一體」的架構下，對於田野工作的內涵和定位卻有不一樣的理解。也就是說，知識不是只從田野工作的互動過程形成的，學科（在此指社會學）基本議題的提問與思考更是形塑田野的進行、甚至與研究對象之間對話方式的重要因素。

不同於《田野的技藝》不乏他鄉／他者的研究事例，《以身為度》筆下的是斯土斯民、當下你我生活的台灣社會，題材不但多元且不乏禁忌議題。當謝國雄和劉怡昀分別以構成台灣資本主義經濟一環的茶葉種作和企業界上班族探討工資和勞動的性質時，吳偉立則以邊緣化於制式經濟體制但廣見於台灣社會的飲料店為例，分享實做遭遇的困境與解決方式。當劉惠純以空服員為例，指出存在於這些被羨慕的「空中少爺／小姐」背後隱含的「情緒勞動」議題時，性別這個因素的討論，也分別見於高穎超和李慈穎探討迄今仍為敏感的「做兵」和「同志」，進而帶入研究者身體經驗這個重要面向。也是因為個人切身身體經驗，葉虹靈踏入生機飲食這個領域，並以生機飲食認證、分類背後的龐雜社會機制做為研究課題。至於鄭玉菁的購物之旅，雖是以「形象資本」來理論化媒介勞動過程，她的田野既是虛擬的（因為透過電視），又是多面與多線的（形塑商品形象的各式各樣媒介勞動者）。

儘管研究對象不同，但是由於作者們一起修習「田野工作：範例與實做」這門課程，在實做前已有範例的閱讀，⁸ 加上「四位一體」

8 研讀這些範例的用意在於體會「四位一體」的意義，包括學習田野的具體操作（田野

是整本書的主軸，這些文章其實也可以從其提問的理論議題有著不同的組合。以勞動力為例，不同的產業方式，如茶鄉農作、服務業、小頭家，是否有不同的性質與結合？對於在地台灣資本主義經濟的性質可以提供怎樣的解釋？又如中介或承載不同力量的身體，展現於當兵與有機飲食或者勞動過程之間的「身體觀」又將如何區辨？當葉虹靈以「味蕾」做為她個人身體經驗的媒介時，高穎超筆下的身體卻是情慾的交會。⁹ 進一步結合發展為更具發展性理論議題的可能性，也使本書可以有不同的閱讀和思維方式。正是如此，我們可以從另一個角度思考田野工作在「四位一體」架構的定位。

基本上，筆者相當贊同謝國雄指出「採取田野工作的社會學研究有一個整體面貌」的重要性（頁 39）。但這個整體面貌是指什麼？跟人類學宣稱田野工作可以培養「整體的全貌觀」（黃應貴 1994: 20），是否具有同樣的意涵？

人類學者認為大部分社會文化知識及其傳遞常是隱晦、不明說的，因此人類學從事長期田野工作，從細膩與複雜的日常生活面貌瞭解研究對象的性質。這些知識往往跨越研究者設定的「概念範疇」，即使關鍵用語的意涵也不是與社會「事實」(facts)或制度呈現一對一的對應關係（參閱黃宣衛 2004；Jenkins 1994）。異文化的田野工作更凸顯比較視野的重要性，使研究者必須隨時反省他習而不察的種種預設。就此而言，《以身為度》的文章，除了謝國雄因為有豐富田野經驗，而且也完成《茶鄉社會誌》這本專著，可以在這樣的基礎上具體說明他對於「四位一體」的觀點外，其他作者是在理解這個架構的同時，進行他們的研究。這樣的限制是否會形塑他們如何看待田野工作？或者加強田野工作應該怎樣定位的某種看法？如果田野工作是

技法)、熟習社會分析的基本議題、體會不同性質的田野，以及分享社會學家與人類學家的田野經驗，藉此反省社會學知識的認識論與存在論（頁 365-367）。

9 當全書有一個共同接受的架構時，並不表示田野經驗對於每位作者的研究意義都是一樣的。例如，身體經驗在「做兵」和「有機飲食」，就被賦予不一樣的重要性：前者強調若沒有「親身」的經驗，是看不到一些現象及其重要性，後者則藉由身體的磨難而引發研究動機。

「需要長期深入經營的學術工作」（林文蘭，頁 359），有限的時間無疑地會局限全貌觀理解現象的可能發展。再者，研究不同社會文化可能的比較視野及其間的反思，又如何呈現在研究自己社會的過程中？

因此，當作者們提到田野研究過程及其間的經歷與感受時，最主要的部份毋寧是在釐清不同層次的資料與分析，資料也多以他們認定的範圍內為主，而無法像謝國雄那樣結合不同層面的討論。例如，不論是任何形式的勞動，除了與勞動具體有關的場域外，我們並不知道與個人密切關連的身體、情緒、住家生活，甚至休閒方式，對於作者理解勞動過程有怎樣的幫助？在這種情況下，學科基本議題反而是研究過程中一直出現的對話對象。一位作者生動地傳遞了這樣的訊息，她說：「這些提問，『究竟觸及了哪些社會學的基本問題？這樣的課題可以與哪個社會學的分支領域相關？做這個有機農業的社會學意涵在哪些地方？』」（葉虹靈，頁 300-301）。

即使是謝國雄，也有類似的經驗。他從事茶鄉研究時，曾在日記上這樣寫著：「……經過這次田野，我想我可能不是很好的田野工作者，因為我不能在田野中很自在地生活與做研究。另一方面，我也覺得自己的田野資料，大概無法完全回答我原先提出的基本文化分類觀念的問題，看起來沒有什麼突破。這逼我反省：我為什麼會走到這條路來？有很大的一部份來自人類學的影響。人類學以『文化』為焦點，對於人類生活中的主觀意義，有十分細緻的掌握。因為以異文化為研究對象，所以可以呈現人類社會生活的諸多變異。但人類學的研究對象大部分是部落社會，其所發展出來的觀念與論點，是否足以研究當代複雜社會？……以當代社會為主要課題的社會學，是否得回到社會學最聚焦的課題：資本主義（特別是資本主義中的勞資關係）、形塑勞資關係的制度設計（如工會、社會福利與社會保險）與現代國家？」（頁 47-48，筆者強調）。「勞動力」之成為本論文集的一個主要的研究議題，或許也說明了學科基本議題的影響。

從某個角度來說，類似的影響也以某種方式顯現在作者們使用的

詞彙，其中，最明顯的莫過於「抵抗」、「抗拒」、「反抗」和「自我剝削」等用語（如頁 157, 248）。這些用語提醒被研究者的主體性與主動性是不容忽視的課題，這也是勞動力研究關切且有其理論與實踐上的意義。但什麼是「抵抗」、「自我剝削」？是否不同事例使用這些用語時，是指稱同樣的現象且具有相同的性質？過度強調「抵抗」或「自我剝削」，也可能忽略現象的複雜性。以女同志研究為例，就如作者所說的，人類學不會只談「家」（李慈穎，頁 140），而且應該將「原生家庭—同志—衍生家庭」視為完整的關聯（頁 127）。但是，同志的議題終究不單是父系親屬結構、家的構成，更涉及到同志的社會關係網絡的性質，以及「親屬關係」與「性別」及相關的隱喻，如何結合並且在社會生活中作用。至於現實生活中同志家庭與父系親屬結構共存過程的現象，如跳脫「抵抗」的思維，或許可以有更為細膩、另類的理解。¹⁰

要言之，田野工作在「四位一體」的架構的位置既是重要又曖昧的。一方面，它以「研究技法」的面目出現（謝國雄，頁 41-52），因此「田野工作擅長掌握研究對象主觀世界的意義，但對於田野外的平行歷史、鉅觀條件則無法充分掌握」（高穎超，頁 118）。另一方面，田野工作又不是在呈現被研究對象的日常生活面貌，而是技法、基本議題、存在論與知識論四者的「交集」，是研究的場域。這種曖昧性可以用編者也是作者這段話總結：「田野工作的技法、議題、認識論與存在論四者的精確關係，不易言明；孰先孰後，亦難判定；但此進則彼進，彼深則此深。四位一體，誰曰不宜？」（謝國雄，頁 90）。

10 楊淑媛指出，布農人的順從並不只是被動的適應而已，而是「解構了統治者所使用的階序性的親屬表徵，將之轉變為他們對地位高或力量大的一方必須照顧與保護弱勢的一方，又不會削弱後者之自主性的看法」。就此而言，「反抗」的概念過份模糊和擴張，以致忽略被統治者對權力再生產的參與等問題(2004: 110)。換言之，布農人透過順從和配合，與統治者發展出一種親密、歡愉的關係來改變彼此之間的權力差距。這樣的互動方式實與他們親屬與政治領導權的觀念認識有著密切的關係。這個例子也凸顯出異文化研究對於學科既有理論的反思所具有的意義。

四、結語：他山之石、「他者」之鏡

《田野的技藝》和《以身為度》二書同以田野工作為題，強調其重要性，尤其田野工作與學科知識的關係。然而，對照二書內容，卻呈現出明顯的差異。概言之，人類學為主的《田野的技藝》一書的作者們，從個人的田野經驗呈現出研究過程的複雜性，但是也因為過度著重個人以往田野經驗的描述，未能從日後具體研究成果闡述田野工作在知識建構過程中的位置，致使田野工作與學科知識建構之間的關係仍未得到應有的討論，反而更強化了人類學的人文色彩。如此一來，田野工作仍然是個「黑盒子」。

相較之下，《以身為度》以「四位一體」的架構定位田野工作，指出田野技法和學科議題、知識論以及存在論之間的關係，而且個案清楚呈現出研究者蒐集與分析資料，以及提問與修正研究問題等反覆交錯的過程，不但是方法論課程很好的範例，也提供我們對於學術知識生產的過程有了更進一步的瞭解。¹¹ 然而，在「四位一體」的架構下，以研究者自身當做媒介探究的被研究者生活世界，雖然一開始由研究技法、基本議題、存在論與知識論四者界定，但是如何藉由田野工作，呈現被研究者觀點以及日常生活的複雜性與豐富性，進而反思其間的關係，就成為具有挑戰性的問題。

誠如前言，田野工作向來被視為是人類學這門學科的標記（參閱 Gupta and Ferguson 1997; Hughes 1960），但是人類學者對於田野工作在人類學知識建構的意義，卻是眾說紛紜、莫衷一是，甚至意見相左。強調它對人類學的重要性者是這樣說著：「田野調查之於人類學，就如殉道者的鮮血之於教會」（C. G. Seligman）、「它成就了我們。沒有田野工作，我們什麼都不是」（It makes us what we are. With-

11 《以身為度》以「田野工作的教與學」為副標題（筆者強調），的確反映出這個特色。社會學一開始相當強調方法論和認識論的問題，而人類學則對一般方法論問題冷漠，即使與學科知識建構密切的田野工作，有關這方面的討論，可參考蔣斌(1996)。

out it we are nothing, 引自黃宣衛 2004: 124)。持比較保留意見者，則認為田野工作儘管重要，卻不是人類學知識的唯一來源。Paul Dresch 和 Wendy James 兩人合寫於一本有關人類學田野研究論文集的導論，第一句話就這樣寫著：「研究、撰寫和教導好的人類學並不只是仰仗第一手的田野工作」(To research, write, and teach good anthropology does not depend only on first-hand fieldwork) (2001: 1)。他們進而指出，在結構主義席捲人文學科之前，英國的人類學早已贏得歷史學、哲學和神學等學科的敬仰，其主要原因不在於人類學的田野資料，也不是研究者的個人經驗，而是分析民族誌資料的方式(2001: 3-4)。英國著名史學者 E. P. Thompson (1977: 248)曾經這樣讚賞人類學：「人類學的刺激，主要並不是在於理論的建構，而是在於設定新問題，以新的方式看舊問題」(The anthropological impulse is chiefly felt, not in the model-building, but in locating new problems, in seeing old problems in new ways)。

猶有甚者，另一些學者則從人類學的發展史，指出田野調查(field research)的重要性並不像一般想像的那樣不證自明。相反地，它不但因為人類學者不同的研究論點有著不同的重要性，甚至在形塑人類學如何成為一門專業學科的過程中，扮演著舉足輕重的位置。這個「田野工作革命」(the fieldwork revolution)固然確立人類學研究的經驗基礎，但也忽略了歷史和文化接觸、動態歷史發展等重要議題的討論。更何況並不是所有人類學者都從事田野工作（參閱 Gupta and Ferguson 1997）。

與其直接介入兩造之間的爭議中，我們先從人類學整個知識生產過程來看田野工作的位置。

從時間序列來說，田野工作是後於研究前的準備（從學科訓練到撰寫研究計畫），但先於田野工作之後的民族誌撰寫。就空間位置來說，「在這裡」(being here)、「到過那裡」(being there)與「回到這裡」(coming home)代表著研究歷程的三大階段：「在這裡」指人類學者閱讀文獻（包括社會文化理論和地方概覽圖書），「到那裡」是到

田野調查，「回到這裡」是把獲得的資料（包括觀察的日記和文獻）進行整理、分析，與撰寫民族誌（王銘銘 2000: 192-193）。

這樣的區分或許簡化了人類學研究過程的複雜性，但是這些不同的時空甚至順序，至少說明了：首先，研究者不是在「空白無知」的狀態前往田野地點；相反地，他是帶著觀念與訓練，而且因為某些條件選擇他的田野地點或研究議題(Unnithan-Kumar and De Neve 2006: 3-4; Watson 1999: 1)，甚至既有的區域民族誌性質也影響他研究問題的範圍(Fardon 1990)。即使在田野地點，研究者也不是天真、素樸的經驗論者，何況經驗與知識之間並不是一對一的關係（參閱 Beatty 1999）。再者，如 Van Maanen (1988: 4)所說的，民族誌是田野工作的結果，但呈現被研究的社會文化是書寫的民族誌，不是田野工作本身。在書齋撰寫民族誌，包括資料的裁剪貼補，也意味著從另一個時空距離反思田野經驗以及獲取的資料的可能性，甚至民族誌的文體和問題的關懷也限制田野工作（含資料）可能被呈現的方式。

然而，反過來說，研究者雖然因為研究問題選擇田野地點，並且帶著問題意識前往，但研究目的終究不只是為了證明或釐清預先設定的問題。反而由於人類學假定每個社會文化有其特殊性，「他者之鏡」乃成為培養研究者反思與比較視野的重要資產，不同的生活方式也意味著不同形式的田野工作(Forms of fieldwork differ with forms of life, Dresch and James 2000: 16)。就是在人類普同性與社會文化特殊性的拉扯中，凸顯人類學學科知識內在的張力與動力（參閱 Ingold 1994）。

換言之，研究現象的性質與學科議題的關係，隨著田野工作的發展，有著錯綜複雜與辯證的關係。為了說明這種特性，並做為上述說法的具體例證，以下以 Edward Evan Evans-Pritchard 和 Pierre Bourdieu 這兩位學者的研究做為例子。

英國人類學者 Evans-Pritchard (2001[1973])晚年回憶他自己的田野工作，提到他為什麼會在非洲蘇丹地區 Nuer 人的研究中特別注意到牛的重要性，在 Azande 社會則是巫術(witchcraft)，因為那是當地的社

會性質使然。但是，他同時也提到，他如果沒有閱讀過 Levy-Bruhl 的書，他就不會以那樣的方式寫出 Azande 人的巫術；如果沒有看到 Robertson Smith 有關古代阿拉伯人的研究，他也懷疑是否能說服他有關 Nuer 人世系制度的討論；如果他沒有深入中古世紀的研究，他更不會理解 Shilluk 和 Anuak 社會的政治結構等等。

Evans-Pritchard 也以他的例子說明比較研究的重要性。他到 Nuer 人居住的地區之前，曾在 Azande 待留數個月。他沒有看到 Nuer 人有任何重要性的政治權威，這使他自然提問，那麼這些部落群體如何統一？在一連串的詢問中，導致他留意該社會的世系制度(lineage system)的特徵與重要性。相較於 Azande 人重視巫術的情形，Nuer 人對此幾乎不感興趣。他遂問自己，那麼後者又如何解釋不幸或逆境？這後來導致他對於 Nuer 人有關神靈的探討，也成為他討論 Nuer 宗教一書的重點。

對比於 Evans-Pritchard 的情形，Bourdieu (2003)則強調田野工作，尤其異文化，對他的影響。他說，他對他法國家鄉有關家屋(house)的研究，使他以一種他自己認為是創新的方式理解王室(the king's house)，以及王室如何能夠保有或增加它的財產。假如他不是因為對於阿爾及利亞 Kabyle 人的熟悉，他也不可能在 Virginia Woolf 撰寫的 *To the Lighthouse* (《燈塔行》)一書中發現其神話性的結構。

這兩個例子呈現出田野工作與知識建構之間的複雜性。一方面，除了田野工作之外，的確有其他知識資源，另一方面，也同時說明田野工作，尤其不同社會文化的研究，對於人類學知識的累積以及理解自己社會的重要性。這也是為何 Ioan Lewis 就任倫敦大學政經學院人類學系主任的就職演講，會認為 Bronislaw Malinowski 所創立的人類學田野工作成就了人類學者，以及 Seligman 比喻田野工作有如殉道者的鮮血。

這個強調田野工作的傳統從 1960 年代以後，開始受到質疑，尤其是人類學與殖民主義的關係、田野工作掩飾研究者與被研究者不平等的政治經濟關係、人類學者的角色，甚至這門學科知識的客觀性等

等。這些質疑更因為 1967 年出版 Malinowski 生前的田野日記而推波助瀾，包括從 1970 年代中期展開對於田野工作的反思、1980 年代關於民族誌書寫的檢討，以及 1990 年代初期以來有關民族誌的生產脈絡、民族誌實踐的區域性傳統、田野筆記、研究者自我等議題的重視，甚至「田野」和「地點」等概念的重新檢視。儘管不同的形式，¹² 這些反思終究要回到基本的問題：人類學知識的性質。¹³ 贊成與否，田野工作對於這門學科知識建構的重要性為何，仍是一個無法迴避的問題。

相較於國外汗牛充棟的文獻，國內有關田野工作的討論仍不多見。如今《田野的技藝》和《以身為度》二書分別從不同層面討論「田野工作」這個議題，的確令人欣喜。然而，如果《田野的技藝》要證明田野工作仍是人類學學術知識的重要基礎，而且有助於深化社會文化基本議題的討論，《以身為度》的例子是他山之石、可以攻錯。反之，對於主要研究自己社會或從事比較研究的社會學界在思考學科基本議題時，人類學田野工作強調的被研究者觀點、整體全貌觀和比較視野（黃應貴 1994），也應有其足以借鏡之處。將近半個世紀以前，社會學者 Hughes 就已指出田野工作對於社會學的重要性，但是至少在台灣，並沒有很好的發展。《以身為度》令人看到這樣的可能性。「在知識建構過程中，田野工作究竟具有怎樣作用？」也許這個問題仍如「黑盒子」，有待打開。但是，可以預期地是，《田野的技藝》和《以身為度》二書的出版，將為人類學與社會學這兩門學科的研究，帶來更多的對話。¹⁴

12 這些問題的性質並不完全一樣。例如，研究者自我、研究者與被研究者互動、或者區域民族誌的性質，是跟田野工作直接關連；反之，民族誌書寫或者田野筆記，則涉及民族誌再現的問題。不過，兩者之間的關係也跟人類學知識建構的過程有關，畢竟只有田野工作沒有民族誌，不成為知識，更遑論其累積的可能。

13 反省田野經驗的確有它的意義與重要性，但是這樣的反省對於民族誌知識建構有著怎樣的意義，卻有待更詳細的說明。Jean-Paul Dumont 和 Paul Rabinow 的研究提供很好的例子。兩人在 1970 年代中期先後發表他們對於自己田野工作的反省，但是我們從書中卻不清楚這樣的反思與先前民族誌研究有怎樣的關係。

14 或許閱讀二書作者們的碩、博士論文或相關著作之後，再來分析這些著作與二書內容的關係，對於這個問題的討論會更有具體與發展性的觀點。囿於時間，加上《以身為度》的多位作者仍在進行他們的碩士論文研究，這樣的可能性就留待日後或有興趣者。

參考文獻

- 王銘銘(2000)社會人類學。台北：五南。
- 余光弘(1996)參與觀察與參加觀察：以蘭嶼經驗為例略論參與觀察的階段與深度。
國立台灣大學考古人類學刊 51: 59-73。
- 黃宣衛(2004)語言、社會生活與田野工作：評介 Maurice Bloch 有關認知人類學的一些觀點。國立台灣大學考古人類學刊 62: 122-135。
- 黃應貴(1994)從田野工作談人類學家與被研究者的關係。山海文化雙月刊 6: 18-26。
- (2002)關於情緒人類學發展的一些見解——兼評台灣當前有關情緒與文化的研究。新史學 13(3): 117-148。
- 楊淑媛(2004)想像國家：一個民族誌的研究。國立台灣大學考古人類學刊 63: 92-118。
- 蔣斌(1996)反省式民族誌與社會學質化方法：二個研究傳統的文獻評述與討論。
國立台灣大學考古人類學刊 51: 106-128。
- 謝國雄(1997)純勞動：台灣勞動體制諸論。台北，南港：中央研究院社會學研究所。
- (2003)茶鄉社會誌：工資、政府與整體社會範疇。台北，南港：中央研究院社會學研究所。
- Astuti, Rita (1995) *People of the Sea: Identity and Descent among the Vezo of Madagascar*.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Bashkow, Ira (2006) *The Meaning of Whitemen: Race and Modernity in the Orokaiva Cultural World*.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Beatty, Andrew (1999) On Ethnographic Experience: Formative and Informative (Nias, Indonesia). Pp. 74-97 in *Being There: Fieldwork in Anthropology*, edited by C.W. Watson. London: Pluto Press.
- (2005) Emotions in the Field: What Are We Talking About? *Journal of the Royal Anthropological Institute* 11(1): 17-37.
- Bourdieu, Pierre (2003) Participant Objectivation (Huxley Memorial Lecture 2002). *Journal of the Royal Anthropological Institute* (N.S.) 9(2): 281-294.
- Bubandt, Nils, Eric Hirsch, Bruce Kapferer, Emily Martin, and Anna Tsing (2007) Anthropologists Are Talking About Anthropology After Globalization. *Ethnos* 72(1): 102-126.
- Burgess, Robert G., ed. (1992) Learning About Fieldwork. *Studies in Qualitative Methodology*, vol. 3.
- Dresch, Paul, and Wendy James (2000) Introduction: Fieldwork and the Passage of

- Time. Pp. 1-25 in *Anthropologists in a Wider World*, edited by Paul Dresch, Wendy James, and David Parkin. Oxford: Berghahn Books.
- Evans-Pritchard, Edward Evan (2001[1973]) Some Reminiscences and Reflections on Fieldwork. Pp.68-81 in *Ethnography*, vol. 1, edited by Alan Bryman. London: Sage Publications.
- Fardon, Richard (1990) Localizing Strategies: The Regionalization of Ethnographic Accounts. Pp. 1-35 in *Localizing Strategies: Regional Traditions of Ethnographic Writing*, edited by Richard Fardon. Edinburgh: Scottish Academic Press.
- Gupta, Akhil, and James Ferguson, eds. (1997) *Anthropological Locations: Boundaries and Grounds of a Field Science*.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 Hastrup, Kirsten, and Peter Hervik, eds. (1994) *Social Experience and Anthropological Knowledge*. London: Routledge.
- Hughes, Everett C. (1960) The Place of Field Work in Social Science. Introduction to *Field Work: An Introduction to the Social Sciences*, by Buford H. Junker.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Ingold, Tim (1994) General Introduction. Pp. xiii-xxii in *Companion Encyclopedia of Anthropology*, edited by Tim Ingold. London: Routledge.
- Jahoda, Marie, Paul F. Lazarsfeld, and Hans Zeisel (2002) *Marienthal: The Sociography of an Unemployed Community (With a New Introduction by Christian Fleck)*. New Brunswick: Transaction Publishers.
- Jenkins, Timothy (1994) Fieldwork and the Perception of Everyday Life. *Man* (N.S.) 29 (2): 433-455.
- Karp, Ivan, and Martha B. Kendall (2001[1982]) Reflexivity in Field Work. Pp. 28-51 in *Ethnography*, vol. 4, edited by Alan Bryman. London: Sage Publications.
- Lewis, Ioan M. (1996) *Religion in Context: Cults and Christmas*, 2nd ed.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Okely, Judith (2007) Fieldwork Embodied. Pp. 65-79 in *Embodying Sociology: Retrospect, Progress and Prospects*, edited by Chris Shilling. Oxford: Blackwell.
- Olwig, Karen Fog, and Kirsten Hastrup, ed. (1997) *Siting Culture: The Shifting Anthropological Object*. London: Routledge.
- Robbins, Joel, and Sandra Bamford, eds. (1997) Fieldwork Revisited: Changing Contexts of Ethnographic Practice in the Era of Globalization. *Anthropology and Humanism* 22(1) (Special Issue).
- Rosaldo, Renato (1993) Introduction: Grief and a Headhunter's Rage. Pp. 1-21 in

- Culture and Truth: The Remaking of Social Analysis*. Boston: Beacon Press.
- Thompson, E. P. (1977) Folklore, Anthropology, and Social History. *The Indian Historical Review* 3: 247-266.
- Tonkin, Elizabeth (2005) Being There: Emotion and Imagination in Anthropologists' Encounter. Pp. 55-69 in *Mixed Emotions: Anthropological Studies of Feeling*, edited by Kay Milton and Maruška Svašek. Oxford: Berg.
- Unnithan-Kumar, Maya, and Geert De Neve (2006) Introduction: Producing Fields, Selves and Anthropology. Pp. 1-16 in *Critical Journeys: The Making of Anthropologists*, edited by Geert De Neve and Maya Unnithan-Kumar. Aldershot, Hampshire: Ashgate.
- Van Maanen, John (1988) *Tales of the Field: On Writing Ethnography*.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Watson, C. W. (1999) Introduction: The Quality of Being There. Pp. 1-24 in *Being There: Fieldwork in Anthropology*, edited by C. W. Watson. London: Pluto Press.

附錄

一、《田野的技藝：自我、研究與知識建構》目錄

導論：非關田野，非關技藝（郭佩宜、王宏仁）

第一部 剛到田野就跌一跤

1. 田野中的地雷：我的砂拉越經驗（林開忠）
2. 遇見田野，遇見官僚體制（張雯勤）

賦格曲一

第二部 田野尷尬——從文化包袱到文化體悟

3. 我不是「白人」：一個人類學家的難題（郭佩宜）
4. 不是穿綠色制服的都是軍人：田野想像的落差（王宏仁）
5. 交錯與返照的身影：竹富島民、女兒與我（趙綺芳）

賦格曲二

第三部 田野非常政治

6. 政治的人類學，人類學的政治：田野工作的道德想像（莊雅仲）

7. 「危險」的人類學家（容邵武）
8. 後台故事：做田野與寫文章（龔宜君）
9. 從排灣族的命名談起：田野關係的建立與政治（顧坤惠）

賦格曲三

第四部 田野和生命的協奏曲

10. 經驗、情感與人類學的詮釋：我與花蓮 Truku 人（邱韻芳）
11. 田野意象與祖先的凝視（林秀幸）

賦格曲四

二、《以身為度，如是我做：田野工作的教與學》目錄

序言（謝國雄）

第一部分 師說

- 第一章 以身為度、如是我做：田野工作的教與學（謝國雄）
- 第二章 四位一體的田野工作：《茶鄉社會誌》的例子（謝國雄）

第二部分 生說

- 第三章 做兵「轉大人」：田野邂逅的能與不能（高穎超）
 - 第四章 女同志成家路迢迢：如何深化提問（李慈穎）
 - 第五章 象牙塔的業務機密：參與實做與四位一體（吳偉立）
 - 第六章 是責任制，非責任制：如何確立現象（劉怡昀）
 - 第七章 解開空服員的黑盒子：轉化提問、進行訪問與分析編碼（劉惠純）
 - 第八章 田野客，遊社會：談如何發展概念與我的電視購物田野之旅（鄭玉菁）
 - 第九章 穿對鞋子進菜畦：反躬自省與田野工作（葉虹靈）
 - 第十章 以「田野」為師：打造一個群學協力網（林文蘭）
- 跋（諸生）

附錄：「田野工作：範例與實做」課程大綱